臺灣出版與閱讀 2616-5074
115 年第 1 期（總號第 33 期） 民國 115 年 6 月（2026.6） 頁 41-45 國家圖書館

鍾理和：反虛無主義的戰爭文學

林政良 方格子沙龍《沉溺在經典閱讀中的 John Lin》版主

四分五裂的臺灣戰爭文學傳統

我們對於戰爭文學的基本觀念，可說源自於荷馬的《伊里亞德》，以及司馬遷的《史記．項羽本紀》，從血肉橫飛的肉搏戰，延伸到信念與命運的對決，進而擴展到形而上的反思，深刻思考人類在殘酷的戰爭之後必須得到的教訓。以這個敍事傳統來看，戰爭不只是軍事上的片面衝突，也是文化與思想上的全面衝突，因此，戰爭文學可說是從戰爭引發的全方位探索，它必須回應眾人因為戰爭所受到的痛苦與折磨，並且對抗滿目瘡痍之後油然而生的虛無主義。

說到臺灣的戰爭文學傳統，就跟臺灣的國家認同一樣四分五裂，白先勇的《臺北人》和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就像是同一片土地上互不相交的平行時空，而這樣政治上的分裂，到了現代仍然劍拔弩張，從中國出發的國族認同，跟從臺灣出發的國族認同，兩者的衝突與鴻溝仍無解法，對兩個陣營失望的人，因而產生政治上的虛無主義。我試著從臺灣的文學傳統去尋找對抗當代虛無主義的藥方，「鍾理和」三個字就自然而然的浮現在我的心頭，這位出生在日治時期的臺灣美濃、遷居中國、戰後返鄉的文學家，經歷了中日戰爭、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反抗傳統的同姓之婚，甚至在反共文學的打壓下屢遭退稿，自身的作品就足以構成臺灣的戰爭文學史。就這樣，鍾理和這位在人生後半段被肺病折磨到不成人形的文學家，就以他終身反抗不懈的姿態，駁斥著當代「一切都無所謂」的病態潮流，接下來以鍾理和人生經歷過的幾場重要戰役，回顧在臺灣這片土地上不該被忘卻的戰鬥之魂。

不論是誰的對日抗戰，臺灣人一直身在其中

鍾理和的小說〈原鄉人〉中頻頻提到的「二哥」，就是鍾理和同父異母的弟弟鍾和鳴，1940 年到中國參加抗戰，加入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之後，改名為鍾浩東。戰後回台擔任基隆中學的校長，因《光明報》事件被捕入獄，於 1950 年被槍決。鍾浩東在中國的革命歷程非常的坎坷，剛到中國惠陽因為被懷疑是「日諜」，差點被槍斃；好不容易等到日本戰敗，又要在二二八之後力抗國民黨政權，鍾浩東以自己的生命，證明了臺灣人「亞細亞的孤兒」的悲壯命運。

像鍾浩東這樣曾經參與中國抗戰的熱血臺灣青年們紛紛隕落之後，臺灣人就與中國的抗戰敍事漸行漸遠，在戰後的白色恐怖強力壓制下，臺灣人百年來的形象就只剩下被動的角色：被清國割讓給日本，被日本殖民統治，日本戰敗後被國民黨接管。而且戰後由國民黨主導的反共戰鬥文藝，讓臺灣的文壇成為外省作家的專場，本土作家完全沒有對日抗戰的話語權，就這樣，對日抗戰成為國民黨的專利，臺灣人就此成為對日抗戰的局外人，這個情況一直要到解嚴後才漸漸有所改變。

回到鍾理和小說〈原鄉人〉的時代背景，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後，臺灣人即使身處日本人的統治之下，仍然隨時關心「祖國」的各種發展，就算不是每個臺灣人都像鍾浩東那樣直接參與對日抗戰，但是即使跟著日本人一起慶祝「南京陷落」，臺灣人並不會真心希望中國也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原鄉人〉的文字中，臺灣人期待和祖國一起奮鬥的心情，是非常熱切的：

> …村人們喜歡聽父親敘述中國的事情。原鄉怎樣，怎樣，是他們百聽不厭的話題。父親敘述中國時，那口吻就和一個人在敘述從前顯赫而今沒落的舅舅家一樣，帶了二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嘆息。…他們衷心願見舅舅家強盛，但現實的舅舅家卻令他們傷心，我常常聽見他們嘆息：「原鄉！原鄉！」
>
> …戰事越演越烈，防衛團的活動範圍愈來愈廣：送出征軍人、提燈遊行、防空演習、交通管制。四個月間，北平天津、太原、相繼淪陷，屏東的日本人歡喜若狂…就在這時候，二哥自日本匆匆回來了…他們用流利的日語彼此辯論著，他們時常提起文化協會、六十三條、中國、民族、殖民地等名詞…我告訴他我也要去大陸。二哥微露笑意、靜靜低低地說：好，好，我歡迎你來。
>
> …其後不久，我就走了——到大陸去。…我沒有給自己定下要做什麼的計劃，祇想離開當時的臺灣；也沒有到重慶去找二哥。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二哥如此，我亦沒有例外。 ——〈原鄉人〉

這句「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曾經在 2004 年被中國總理温家寶所引用，但是〈原鄉人〉並不是那種宣揚中國民族主義的樣板文章，實際上，它充滿臺灣人身為日本殖民地人民的矛盾與困惑，以及對中國被日本侵略的同情，甚至讓小說中的人物「二哥」以實際行動投入中國的對日抗戰，充分展現了臺灣人化被動為主動的勇敢。臺灣人自始至終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參與對日抗戰，〈原鄉人〉這篇小說就是最好的歷史見證，隨著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在 2018 年撤銷鍾浩東的有罪判決，小說中的「二哥」不再是國民黨認定罪該萬死的匪諜，而是即知即行、用行動衝破時代枷鎖的昂然臺灣青年，寫下了臺灣對日抗戰史的新頁。

目擊二二八的當代作家

現存的《鍾理和日記》從 1945 年日本投降後的 9 月 9 號開始，一直到他過世前一年 1959 年為止。在 1947 年二二八發生期間，因為剛好在台大醫院住院的緣故，鍾理和詳細的記錄了當年台大醫院內的見聞，也成為了少數目睹二二八之後還能全身而退的的當代作家。把時間回溯到他戰後的兩篇散文〈白薯的悲哀〉以及〈祖國歸來〉，其實就預告了二二八發生的遠因：

> …臺灣人——奴才，似乎是一樣的。幾乎無可疑義，人們都要帶著侮蔑的口吻說：那是討厭而可惡的傢伙！這，他們是經驗了很多了。例如有一回，他們的一個孩子說要買國旗，於是就有人走來問他：「你是要買哪國的國旗？日本的可不大好買了！」又有這樣子問他們的人：你們吃飽了日本飯了吧？又指著報紙上日本投降的消息給他們看，說：你們看了這個難受不難受？
>
> ——〈白薯的悲哀〉

> 如照上面那位某台胞的說法，在偽政權之下做事的人都為奸為偽，那麼臺灣人過去曾為日本籍民，因此之故，政府一心要以敵以奸看待，那我們便只好磕破嘴唇和血嚥，不但要使自己容忍下去，也要以此相勸大家。可是哪一面，政府卻又下布告說明，臺灣人由日本投降之日起，即已恢復國籍。事實又不盡如此。…只有在中國，我們才到處看得見隨便抓人、軍警隨便檢查老百姓的身子與行李的事情，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著。所以我之受檢查，…則係因為「台人皆能享受我國民待遇」的緣故…
>
> ——〈祖國歸來〉

臺灣人被貶成「敵」「奸」並不只發生在戰後那幾年，事實上在後來 1970 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軍系作家朱西甯也還是發出這樣的警告／恐嚇：

> 鄉土文藝是很分明地被侷限在臺灣的鄉土，這也沒有什麼不對，要留意尚在這片曾被日本占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與精誠度如何？
>
> ——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

外來的接收者以這種「非我族類」「以敵以奸」的心態來管理臺灣人民，終於爆發了二二八：

> …半頃，在自己所住第一內科病房後面不遠，忽然傳來一連串怪似鞭炮的聲音，看看街道則見很多人驚惶而跑，狀極慌亂。據云那地方是長官公署，那聲音是槍聲，事情是長官公署前已架好了機關槍，正在向手無寸鐵的無辜掃射…公署的警察及兵士只顧搶被掃死的人所棄的自行車，至于死人他們是好像沒有看見。並且因有機槍，民眾也不敢去收拾屍體，就是他們抬來的還是一位正好由

那裡經過的美國人幫忙之下搶出的…

——《鍾理和日記》

在二二八期間，本島人士分成了兩派，一派透過與國民黨協商來設法平息動亂並推動政治改革，一派則是組成了軍隊，以武力與國民黨對抗。

在國民黨以強勢武力無差別鎮壓之後，鍾理和的弟弟鍾和鳴（鍾浩東）不改滿腔熱血，在二二八之後投入反國民黨的革命運動，最後在《光明報》事件之後入獄，結束了充滿傳奇的一生。體弱多病頻頻住院的鍾理和，會用怎樣的心情去看待這個老是衝第一線、卻不幸犧牲的弟弟呢？在病情得到控制的 1950 年 10 月 14 日，也是鍾和鳴被槍決的當天，鍾理和寫下了這樣的內容：

看來自己不但居然沒有死掉，而且似乎還再一次獲得了生命，雖然還要再靜養一至二年。我要好好的抓住和保重自己的健康，切不可浪費！

這是我的新生！

和鳴死

——《鍾理和日記》

因為這些烈士的犧牲，讓臺灣人民得以倖存，鍾理和在大病之後，改以文學來一決勝負，並迎來了他創作的高峰期。

文學就是一場戰爭

鍾理和的早年，因同姓之婚而被迫離鄉背井到中國去生活，二戰後回台，為了醫治嚴重肺病幾乎傾家盪產，過著貧困的生活。經歷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在國民黨主導的反共戰鬥文藝洪流中頻頻被退稿，也經歷了種種的自我否定與懷疑。儘管如此，他的一生從來沒有「不寫作」的選項，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也還在修訂他的小說〈雨〉，最後血染稿紙而病逝。

文學是最折磨人的事業，不論是在鍾理和身處的日治時代以及臺灣戒嚴時代，或是在現代這個 AI 生成氾濫的時代，追求文學之路一向坎坷，就算是戒嚴時代受官方支持的反共戰鬥文藝，也遠遠不敵瓊瑤金庸等通俗小說的膾炙人口。鍾理和所追求的偉大作品是這樣的：

一部作品被列為世界最偉大的小說之列，絕不單是他有趣，有特性，有感情，對於社會人生亦必賦有極大的感化力，必然是一個作家的人格和正義感透過筆尖流到紙面上的東西。如果他先沒有對崇高的東西的感受性，他就不會對讀者有所啟迪。

——《鍾理和日記》

但是追求偉大作品之路，終究不是容易變現的途徑，鍾理和投稿收到的稿費頂多只能稍微貼補家用，平常還是得養雞養鴨種田來維持生計，並且因為身體衰弱，連正常朝九晚五的工作都做不來，只能在家工作，然後在日常生活的縫隙中

偷空寫作。被生活所逼一直是鍾理和最無可奈何的處境：

> 從前我有滿腔的理想和熱情，以為祇要能把這理想這熱情發抒發抒，則其餘便不值得去計較。所以曾對那些從自己的崗位上轉入仕途或商界的文藝工作者覺得不屑，覺得在品德上缺少點什麼。明白光寫稿子不行，還得吃飯，那還是後來的事情。到了現在則更進一步明白不但要吃飯，而且必須先有飯吃，然後才能寫稿子。…雖然後來那篇長篇獲得中華文藝獎，但我已看清對此是越少留戀越好。二十年來那一日不讓自己掉在苦悶和失敗的泥沼中滾轉，嚐遍人世辛酸？…
>
> ——〈薪水三百元〉

文學就是一場戰爭，必須在文學的疆土裏，用前所未見的方式攻城略地：基於知識而超越知識，基於感情而昇華感情，基於信仰而不受限於信仰…這些戰役就交由這些肚子餓得扁扁的、被生活逼迫到透不過氣的文學家們，不自量力的去執行。儘管「窮而後工」不見得是偉大作品的必要條件，但是想得到超越世俗的心靈能力，總是要付出一點代價，這種理想與現實的拉鋸，就成為歷代文學家既痛苦又充實的必備歷練。

文學的戰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戰勝現實世界中無所不在的虛無主義。所謂的虛無主義，就是認為這個世界生無可戀，人類不論做什麼努力都無濟於事，只有等到這個世界毀滅了，人類才能看見新的希望。在卡繆二戰後的著作《反抗者》，描述了這些從二戰前延續到二戰後無所不在的虛無主義，認為人們想要在物質與心靈的廢墟中重建新生，必須去對抗這些虛無主義。

文學用來對抗虛無主義的秘密武器，就是這些肚子餓得扁扁的、被生活逼迫到透不過氣的文學家們，因為他們在最應該產生虛無主義的環境中，以不朽的創作戰勝了虛無主義。在二二八之後，白色恐怖的魔掌無所不至，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鍾理和描述他返台見聞的「故鄉四部」，是令人難忘的作品。最後一篇〈親家與山歌〉，在一片荒蕪的戰後臺灣，以客家山歌劃破了死寂，在苦難尚未結束的時候，預告了苦難將會過去，並預告了一定會到來的新生活與新生命，謹以此文的精彩段落作為本文的結束。

> 這是很奇怪的；山歌的平靜、熱情、憧憬，和周圍的徬徨、不安而冷涼的現實，是極端的不調和。在那裡，通過愛情的眷戀，表現著對生的熱烈愛好和執著。…是的！到時，那些衰老的、醜惡的、病態的，都會倒下；於是年輕的、健康和正常的，便會像幼芽似的由倒下的朽樹下面茁壯起來，取而代之。
>
> ——〈親家與山歌〉